

詩與詩論
譯叢
袁水拍譯



359

目次

詩論

憂節的桂冠們 (V. J. Jerome)	一
科勒律治和華茲華斯合論 (Joseph Freeman)	一四
惠特曼論 (D. S. Mirsky)	二四
高當代英國青年詩人 (D. Caplanakis)	五〇
反抗中的詩人 (Stephen Spender)	七二
現代詩歌中的感性 (Stephen Spender)	八五
托爾斯泰對於藝術的見解 (L. Tolstoy)	九五
斐列克·紐頓論藝術 (Eric Newton)	一二五



詩

軍火在西班牙 (Rex Warner)	一三三
眼睛 (失名)	一三四
許斯那 (John Cornford)	一三五
給我們這一天 (James Nugent)	一三七
紅土壤的相思 (L. Hughes)	一六七
荆棘之歌 (L. Aragon)	一七〇
論詩歌中的態度 (附錄)	一七四

變節的桂冠們

V. F. Jerome

歷史常常重複這樣的例子：就是智識份子，在人民運動的緊急關頭時叛變了，固然也有許多勇敢地堅持着而始終如一的。在最初的幾個資產階級革命中，當政治變動急速的時候，英法兩國的文化傳播者發生了動搖與退却。他們的徬徨，反映了（即使在它革命的階段）資產階級的半吊子和妥協性。

然而即使他們是不可靠的，智識份子這一集團實在還是資產階級革命的主要角色。因為他們代表了工業發展所招致而來的大量的智識羣衆。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智識份子，爲英法的資產階級革命準備了思想意識上的基地。有少數例外的智識份子，甚至對年青的資本主義表示出批判的態度，而更進一步去宣傳空想的社會主義。在另一方面，腐爛的封建主義依舊有足夠的力量，影響一大部份的智識份子去爲牠服務。

爲了紀念克朗威爾這個英國十七世紀資產階級革命的領袖的死，那個尚未變節的約翰·德里頓（註一）寫道：

「他的偉大得諸上蒼，

不靠幸運，他自造了英名……

他使我們成爲大陸上的自由人民，

而從前我們則是自然的俘虜……」

那時德里頓是吉爾伯特·畢克林爵士的祕書，他是克朗威爾廷上的御前大臣，曾經審判過查理一世的法官之一。德里頓爲那反抗封建壓迫者的大叛變（Great Rebellion）而寫作辯護，以及稱頌克朗威爾將國王處死的澈底：

「戰爭是我們的消耗，却是他們的盈利的商業；

我們內心流血，他們却延長我們的苦楚；

他爲我們鬥爭，讓我們停止苦戰，

爲了試驗止血，他割開了自己的血管。」

十八個月之後，也就是這個德里頓，寫了一首詩歌頌斯圖亞特朝的復辟，接着就又寫了「加冕頌詩」。可慨的是當「紀念俄立佛·克朗威爾的英雄體詩」的墨跡還沒有乾，緊跟着就是哀念在民主政制期內那年輕的查理的流亡：

「爲了他的遠離，教堂和國家一致悲傷，

教士們瘋顛，朝廷裏發生了內訌；

有閱歷的耆老墮入深沉的絕望。

眼看叛徒們跋扈，皇朝遭殃。」

德里頓現在歌頌着反動的保王主義：

「多猜疑的禽類也不再疑心危險，

在我們國王的保護之下，一切都安全。」

擁護封建制度的反動派恢復了最高的顯要官職，雖則這種恢復並不就是封建制度的復活，可是天主教重新又將牠的觸角伸張到四面八方，國王和他們有祕密的默契更是大家知道的事。於是這個革命的清教徒的詩人改設了，開始皈依了羅馬教會（註二）。

在約翰·德里頓的對面站着約翰·密爾頓（John Milton），是位更偉大的詩人，更偉大的人（註三）。當那些被收買了的胆怯的作家們，背棄共和國而諂媚王朝的時候，密爾頓的發言代表着那最進步的，最堅持的革命的資產階級中的一部份，反抗那兇暴的壓制。他用戰鬥的聲音攻擊那批復辟派，就因為他們「回復到最近被若干騙子們所安排的束縛之中去的那種有害的諷刺」。他挺立着決不妥協，爲了民主自由，爲了政教劃分，爲了共和國，他相信假如共和國能繼續生存的話，牠可能把封建關係一掃而光。這時候並不是德里頓，而正是密爾頓代表着十七世紀的真正的，朝前面看的智識份子——這是

些不領乾俸的，和不帶桂冠的人；他們被羞辱，被禁錮，被吊死。和他們同代的，以及後代的真誠的文化工作者。沒有一個人不尊敬密爾頓的堅貞，無論是貧窮，盲目，保王派的嘲罵的箭，都不足動搖他分毫；後世一致讚美他的超絕的勇敢，和赤熱的忠忱——他的不畏死亡的戰到最後的薩姆生式的戰鬥精神（註四）。

法蘭西大革命像電光一樣，劃過了全世界的蒼穹，為每一處地方的被壓迫者照亮了爭取自由的大道。「人權宣言」的發表，召喚了全人類向封建寡頭政治作鬥爭，而這鬥爭正日益擴大着，農民大眾，城市工人，以及資產階級民主派當中的進步份子，四面八方都集合在這個革命運動之下。在英國，以及在舊大陸和新大陸，對革命的熱烈的同情心普遍於智識份子的各方面。卓越的科學家與文學家們都大大地激動了，其造因是伏爾泰的摧朽拉枯的反牧師主義，海爾維修（Helvétius）和霍爾巴赫（Holbach）的哲學的唯物主義，百科全書派對理性的崇拜，以及羅梭的平等觀與民主思想。

這些智識份子的典型代表，是英國詩人勞白特·蘇賽（Robert Southey）。在他的早年，他是一個熱心革命的擁護者。他的同道詩人是科勒律治和洛伐爾（註五），他創造了一種烏托邦的社會計劃，「萬民平等政治」，想把它在新大陸上實現，「在那兒塞斯刻赫那河正傾注着他的未受束縛的水流」。在蘇賽的革命劇：「華德·推勒」中，那

被捕的約翰·巴爾被控訴，說他是一個叛亂者，煽動百姓，他便這樣回答他的審判官：

「我是約翰·巴爾；但我不是個叛亂者，

這個名稱要給與那妄自尊大者，

他用強力來反對人民的政權……。」

如果這些是罪惡，

爲了人們宣揚那種你所喜稱作怪誕的想法，

說是人類像兄弟一樣，都是平等的，

具有特權的社會是罪惡和壓迫的；

財產權只是一個富人的戲法，

欺騙那些你所壓迫的——

那麼我承認我有罪。」

雖然如此，就在這個時候，英國的反動的潮流還是把蘇養捲走了，他開始攻擊法國大革命の恐怖行動。他的失却均衡的感覺，因爲瑪麗·安托奈脫的被處死刑而刺傷了（註六）。

在創作「華德·推勒」之後，只短短地隔開了兩年。他就這樣稱呼人民：「至於豬

，他們也很像羣衆。」（同樣地，在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信仰的誓言中，可以看到美國的保王黨對於人民的同樣蔑視的語言：「你的人民，閣下，你的人民是一隻大野獸。」）由於他因這種對羣衆的下流的概念，他的保王黨的主子們就把他升充桂冠詩人。拜倫合適地把這位「桂冠」和「依斯克里亞脫」同押了一韻（註七）。

從這個超越的地位上，蘇塞回頭去懷舊的說道：「縱使那些封建時代很壞，牠們到底比起現在這種商業時代來，（註六）

譽和光榮的主義要好得多了。」給蘇塞最好的評語，恐怕只能像一位著名的傳記家所說的：「他既沒有徹底地做一個雅各賓黨人（註八），也沒徹底地成爲一個保王黨。」

科勒律治曾經眼紅地隔看海峽眺望那新的法蘭西，認爲這是新的英國的典範：

「難道只有法國能夠踢走一個暴君？」

難道只有她能夠誇耀：啊，自由，在你的保護之下？」

——科勒律治曾垂下頭「爲不列顛的英名哭泣」，現在却開始對於英國的主人們感到贊成和歡欣了。

「在我的靈魂裏，沒有一個感情，沒有一個具形，

不是從我們的祖國借來的。」

在英國、在法國、普魯士、奧大利和美國以及別處地方的許許多多的羣衆們，糾勸律治們，他們的頭面都正發生在革命的轉變的當兒。無論是城市或是鄉村的羣衆，他們已經充分明瞭大資產階級現在是放棄了對於革命的基本任務。在廢除王權和一七九一年的資產階級與貴族的憲法之後，在一七九二年八月至九月，這些羣衆就廢除了有產公民的立法會議。王權是人民之敵的結合中心，如果不把牠澈底摧毀，民主共和國自然無法實現。結果國王與王后就和外國的元首們商量，一同進行法國反革命的侵略，也在他們的名義之下，歐洲封建的聯盟就在一七九二年的春天進攻這個青年的共和國；也在他們的名義之下，王政復古派和某隆特黨（註九）的調和派一同陰謀摧毀革命。

「祖國在苦難中！」當時成爲大革命的口號，來反對國內和國外的敵人。前線的勝利需要國內戰線上的勝利。王政的廢除象徵了革命的登場。

詩人的背棄革命，不過是王黨的散文寫成韻文而已。資產階級怎樣打算，詩人便怎樣推敲。不列顛的統治階級看着這新的共和國越來越不順眼，認爲封建主義在法國壽終正寢，就是表現一個資產階級的敵手國家正開始形成。英國被工業革命所推動，她的目的是想從法國奪取要塞的海峽口岸和東方的殖民地，企圖阻礙她的工業發展和削弱她的海軍力量。因爲這個緣故，不列顛的資產階級就開始與法國的保王黨以及大陸上的封建

政府猶狼爲奸了。

正像封建的奧地利，普魯士，和俄羅斯一樣，資產階級的英國懼怕着革命的日益緊逼。雅各賓主義風靡於英吉利，蘇格蘭和愛爾蘭。國內的人民對於王黨壓迫的反感，對於政府對法戰爭的憎恨，也日益增長。統治階級被這種恐怖所懾服了，首相威廉·匹特（William Pitt）正像脫下一件寬鬆的袍子，擺脫下他的自由主義，再和革命意識的領導人愛特孟·柏克（Edmund Burke）聯合起來，傾其階級暴政的全力來對付人民（註十）。人身保護律（Habeas Corpus Act）停止實施。同情革命的法蘭西的人士們所舉行的公衆集會，被橫暴地破壞。一切反對王權與貴族言論，遭到禁止，陳舊的反對一切騷動與危險思想的條律又開始復活。政治犯充斥在監獄之中。

戰爭變成了強制的。英國人民只有用愛國主義的短棒來驅使了，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的死刑藉口爲和法國斷絕外交關係的緣由——和誰呢？和法國的資產階級，他們曾經把一個國王的腦袋從塔臺上滾下來，取得了政權！

這一回，『人性』的仁慈之乳汁凝聚在不列顛外交家的血管中。那些『人道主義』的蘇賽們淌下了一瓶一瓶墨水的眼淚，爲最後的路易王悲悼，這種激情只有後一代的蘇賽們爲最後一個尼古拉沙皇的悲悼，才能比擬。

蘇賽們和科勒律治們，瑪金托斯 (James Mackintosh) 們和華茨華斯們 (註十一)，他們都和反動者妥協了，爲了這，他們如願地得到寵幸。詹姆士·瑪金托斯變成詹姆士爵士；威廉·華茨華斯被選做桂冠詩人，勞勃脫·白朗寧 (註十二) 在他的「失掉的領袖」一首詩中，暗指着的就是華茨華斯，這首詩用這樣的行句開頭：

「就爲了一把銀錢，他離開了我們，

就爲了他上衣上扣一條絲帶……」

自尊自重的科學家與文學家要剷除他們的傳統，就得找一些智識份子的領袖如威廉·高特溫 (William Godwin)，他用他的劃時代的「本」政治正義」答覆柏克的主黨的反動。他勇敢地，流利地爲急進的共和派的「Corresponding society」的領袖們辯護，這個團體在一七九四年反雅各賓主義的瘋狂浪潮中遭到審訊的。這個傳統是如約瑟夫·泊里斯脫萊 (Joseph Priestly) 這些人遺下的，他在生活中尋找真理，如同他在實驗室中尋找牠一樣；在一七九一年的一個夜間，當他看見那「教會與王家」的伯明罕的暴徒們燒了他的家，他的科學儀器，以及他的寶貴的筆記的時候，他覺得：他即使受到這樣的剝奪，而火星終會能夠爲下幾代點燃起光明的燈來的。他最後逃到了傑佛遜和富蘭克林的美國去。

在一八四八年法國的智識份子們，和大部份的小資產階級，聯合發動了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傅利葉，聖·西門，和卡倍脫（Cabet）的信徒者——要求終止王權和銀行貴族的統治。一個紅領巾的波特萊爾（Baudelaire），在六月革命中和工人們一起站在巷戰工事之旁（註十四）。然而那些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就心着無產者的前進，開始撤退到財政寡頭的章魚式的掌握裏去了。小資產階級害怕工人階級的力量，甚於害怕大資產階級的上昇，於是反叛了六月暴動。他們違背了自己的利益，讓巴黎的無產者被卡凡納克（Cavaignac）的暴徒所殺戮。拿破崙主義的勝利——這一個陰謀的果實，使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變成冷嘲的犬儒主義，他們的波特萊爾現在歡呼着「牧師，軍人，和詩人」是社會的主體；他現在信奉了基督教和專制主義。他曾經陶醉在「共和國的香味」之中，現在却誹謗共和主義者為「玫瑰與香粉的敵人」。他曾經被「一切是人民的，一切爲了人民」的口號所燃燒，現在却墮入悲觀主義的迷惘中，慨嘆着：

「快些吧，讓我們熄滅這盞點亮的燈，

讓我們沒入夜的陰影中。」

可是工人們沒有熄滅他們的燈火。在他們的失敗的廢墟上，重新又生長起來。他們

從六月的死灰中站起來變成公社的『風雲壯士』。

(註一)約翰·德里頓(一六三一——一七〇〇年)，是英國十七世紀的一位大詩人及劇作家。

(註二)英國當時的統治者，本為斯圖亞特王朝，係採取絕對的君主專制政體，對人民壓迫甚烈，因此引起國內之革命運動。一六四五年六月間革命軍大勝王軍，查理一世幾乎被俘，此後革命浪潮繼續高漲，鎮壓了各地的保王黨的活動，一六四九年一月三十日國王查理一世以叛國罪被控訴最高法院，判處死刑，繼而就建立了克爾威爾的共和政體。一六五八年克爾威爾病死，所謂一六四〇至一六六〇年英國的第一次資產階級的革命，也就告一結束，查理二世於一六六〇年後復登王位，反動的復辟時期就又從此開始。它重新網羅了所有的反動份子，並熱烈擁護羅馬的天主教，仰仗天主教的勢力來作君主政體的支持者，對民主力量壓迫也更甚。

(註三)約翰·密爾登(一六〇八——一六七四年)，英國大詩人，著有長詩『失樂園』等。

(註四)薩姆生是『聖經』中的一位頑強的以色列的英雄和力士。

(註五)勞白特·蘇養(一七七四——一八四三年)，是英國的大詩人及音樂批評

家；科勒律治（一七七二——一八三四年）也是與蘇箋同時的大詩人，名著有『古舟子詠』。

（註六）瑪麗·安托奈脫是路易十六之後，後上斷頭。

（註七）依斯克利亞特是那個出賣耶穌的門徒猶大的姓，此處含着出賣了終身的詩人之意。

（註八）雅各賓黨人是法國大革命中最革命的一派，由羅伯斯庇爾做領導。

（註九）基隆特黨人是法國大革命中右派，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後與王政復古派妥協成爲反革命的力量。

（註十）愛特孟·柏克（一七二九——一七九七年），是當時英國的一位政治家，又是反動派的思想的代表人。

（註十一）瑪金托斯（一七六五——一八三二年），英國的政治家及歷史家，華茨華斯（一七七〇——一八五〇）則是當時一位著名的湖畔詩人。

（註十二）白朗寧（一八一二——一八八九年）英國的名詩人。

（註十三）高特溫（一七五六——一八三六）是英國一位著作家，一生爲正義而鬪爭。泊利斯特萊（一七三三——一八〇四年）則是同時的一位大科學家，後被迫害，

逃至美國。

(註十) 波特萊爾 (一八二一—一八六七年)，法國的大詩人，六月革命係指一八四八年六月間巴黎無產階級的暴動而言，卡芬納克是當時政府中的軍事部長，曾向巴黎的無產者作激烈之進攻及殘酷之屠殺。

科勒律治和華茨華斯合論

Joseph Freeman

法郎西斯·溫瓦 (Francis Widdow) (註) 以小說家的才能，甚至以小說家的方法，敘述了一個魅人而有教育價值的故事，其中主角為兩個詩人和一個女性，他們生活在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暴風雨裏面。作者的卓越的傳記雖則主要是寫賽茂爾·推勒·科勒律治 (Samuel Taylor Coleridge)，可是她把範圍擴大到包括詩人的兩個知己朋友，威廉和陶洛賽·華次華斯 (William and Dorothy Wordsworth)，以及別的朋友們——蘇賽 (Southey) 蘭姆 (Lamb) 赫金孫女郎們 (Hutchinson girls)，還加上這些人所活動的整個文藝的圈子。歷史的波濤在不經意中處處流露出來。在背景後面我們瞥見法蘭西大革命的影子，和畢德 (Pitt) 的英國，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這「具有一個靈魂的三個人」上演，這個奇特的友誼關係造成了，也是毀壞了科勒律治和華茨華斯夫婦。

科勒律治生於一七七二，死於一八三四。溫瓦小姐的敘述止於一八〇二，那時詩人年僅三十。她認為詩人在精神上死於此時，其後的三十年大部份是痛苦與荒廢。退